

方之中与诗集《人底改造》的“批判”

袁 洪 权

(西南科技大学 文学与艺术学院, 绵阳 621010)

摘 要:方之中的军人身份,掩盖了他的作家身份。作为现代中国作家及编辑家,方之中显然被遗忘了。本文试图对方之中的情况做简单介绍,并结合他被批判的诗集《人底改造》进行分析。《人底改造》作为方之中华民国初期重要的文学创作,出版后却遭到《文艺报》的点名批评,这使带有军旅作家身份的方之中,最终停止了文学创作活动,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五十年代初期文艺界的“内部清理”。

关键词:方之中;《人底改造》;文艺批判;内部清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3)01—0061—08

一、方之中其人

最近,笔者在梳理“十月文艺丛书”时,对方之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有一部名为《人底改造》的诗集,纳入到丛书的出版中。但方之中是谁?笔者确实不知道,连基本的线索都没有。一本薄薄的诗集《人底改造》,到底能证明方之中什么呢?笔者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算有十年的时间,但庞杂的现代文学及文人关系,以及文人事诸多复杂点,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并没有完全涉及到。据门岗在论文《一位不该被遗忘的作家——方之中》中透露,《湖南文学史》中连方之中的名字都未提及。^[1]可以想见,方之中在湖南文学界及文学研究界都被如此漠视,更不要说其他地方。2010年10月底,利用到上海教学经验考察与交流的“间隙”,笔者拜访了著名文学史料专家陈子善教授,他给笔者讲述了方之中的一些事迹:方之中早年和鲁迅有过一些交往,编辑过《生存》、《夜莺》、《礼拜六》等进步文学刊物或周报。既然跟鲁迅有交往,显然,20世纪20、30年代的方之中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文学青年。陈子善先生的“提示”,无疑给笔者提供了一条思考的线索,使笔者对方之中产生了独特的、好奇的感觉: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这个人在共和国成立后的遭遇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知道,和鲁迅亲密的、交往过的很多著名文学家,共和国成立后都经历过“炼狱”般的生活。不过,方之中不是正面树立的“榜样”,而是作为对立面,成为文艺批判的“对象”。显然,方之中这个人是不简单的。百度网络上,笔者查看了方之中的基本情况,它有这样的介绍文字:

方之中(1907—1987),湖南省华容县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19师政治指导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湘鄂西秋收暴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张家口卫戍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察哈尔军

收稿日期:2011—09—30

作者简介:袁洪权(1978—),男,土家族,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文学博士,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料及现代思想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人民共和国文艺界的“内部清理”》(11YJC751112)和西南科技大学博士基金资助项目《新中国初期“文艺界”研究》(10zx7150)的部分成果。

区司令部参谋长、察哈尔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5旅副旅长、第20兵团67军199师副师长、第200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军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2]

这同陈子善先生提供的线索存在很大的“差异”,百度百科介绍的,是作为军人的方之中。作为文艺爱好者或文学青年甚或文学家的方之中,并没有被呈现出来。熟悉网络的人都知道,百度百科网络信息只是提供了一种线索,因为它的编辑者的“非专业性”,常常导致这些介绍性文字出现知识性的错误。方之中系军人,并且担任过如此高的军事职务,显然他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当笔者仔细查阅军人的相关信息和资料时,没有想到方之中居然是少将级别的军人,1955年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军人。《黄埔军校三百名将传》中,对方之中是这样介绍的:

方之中(1907-1987),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解放军将领。湖南华容人。1925年秋,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队。1926年3月,正式升入第四期学生队。1926年10月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连政治指导员,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根据党组织的派遣回家乡工作,组织成立中共第一届华容县委,任军事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鄂中鄂西秋收暴动,先后担任汉阳县农民自卫军军长和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师长。1930年,方之中到上海,在国民党的严重白色恐怖之下,从事党的地下斗争。他加入“左联”,主编《生存》月刊和《夜莺》月刊,并积极为《晨报》、《大众日报》等进步报纸撰稿,以文化工作者身份秘密为党工作,坚定地站在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一边,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坚决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方之中曾在国民党第一战区政治部任编辑,在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五军教导大队任军事总教官,为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做了大量工作。1940年,奉调到延安,任边区《群众报》编辑。解放战争时期,方之中先后担任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察哈尔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旅副旅长,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二兵团第二纵队第五旅副旅长、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第二纵队第五旅副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第六十七军第一九九师副师长、第二00师师长等职,先后参加察南战役、保北战役、平张战役、太原战役和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方之中历任华北军区军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等职。1950年,率部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1976年离休后被选为天津市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协常委和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1978年2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7年10月,在天津病逝。^{[3](75-76)}

从军事人物传记知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份比较完整的方之中军事生涯的介绍。但读到1930年代他曾经在上海和鲁迅接触,并编辑《夜莺》等进步文艺刊物的时候,笔者想:作为军人的方之中,其文学生涯更值得我们“关注”。虽然有很多军人后来成为文艺家,但方之中先军人后文艺家,再军人的传奇经历,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道风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居然还拿起笔,写作诗歌,更显示出方之中诗人的“本性”。笔者在读秀数据库继续搜集他的作家生平介绍,发现这则资料更重要。《左联辞典》系对左联成员的介绍,原来方之中是重要的左联成员,书中对他的介绍很详细:

方之中(1908-1987)左翼作家。笔名方镜,湖南华容县人。中共党员。早年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来上海,入群治大学半工半读,在该校结识李初梨、冯乃超、潘梓年、阳翰笙、田汉等左翼作家,受到他们的熏陶。1930年4月1日《萌芽月刊》1卷4期发表他的第一篇杂文《文艺杂观》。同年6月,由阳翰笙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此决心献身左翼文学事业。1934年1月,作《一年来之中国电影运动》一文,认为1933年的优秀电影,“第一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是由小说改成的《春蚕》”,认为这“是一首朴素的田园诗”。同年5月起,为上海《民报》电影副刊《影谭》撰写电影评论。1935年,第一部小说集《诗人的画像》(原名《花家冲》)出版,生活书店经售。1936年3月,编辑左翼文学月刊《夜莺》,得到鲁迅的支持,给刊物送来杂文《三月的租界》。在编辑工作中提倡“新闻小说”,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尖锐化的今日”,作家应当“正视现实”,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应是英雄行动的赞美”,以“策励”读者“再接再厉的勇气。”同年6月,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上签名,支持应用、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同年7月,大力协助左翼文学月刊《现实文学》创刊。同年,在以鲁迅为首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

签名,拥护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同年,小说《速写集》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此外还在《中华月报》、《文学丛报》、《现实文学》、《夜莺》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小说、散文和评论,未收集成册。^{[4](50-51)}

对作为文艺家的“方之中”,《中国文学家辞典》还有这样的补充介绍:“1930年在上海加入‘左联’,1934年加入‘剧联’,任上海艺华影片公司编辑,上海道中女子中学教员,主编《生存》、《夜莺》月刊、《礼拜六》周报。……撰有《湘鄂西苏区的最新一支人民武装》等回忆文章,出版有小说集《诗人画像》、散文集《速写集》等。”^{[5](41)}但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方之中的文学创作生涯却“只字未提”,形成我们研究一个文艺家的“空白地带”,甚至是一个“认识盲区”。这对全面认识有着重要文学活动经历的方之中而言,显然是不适当的。如果按照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角度来看,方之中无疑是一个“军旅作家”,人民共和国初期,这些作家统统称之为“部队作家”或“部队文艺工作者”。据读秀数据库的记载,方之中创作的作品主要有五部,按年代先后顺序为:《诗人画像》(前夜文艺社,一九三五年版)、《花家冲》(龙虎书店,一九三五年版,系《诗人画像》的重版)、《速写集》(上海天马书店,一九三五年版)、《人底改造》(诗集,知识书店,一九五一年版)、《方之中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方之中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当然,在这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文章,并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实,不仅零散的作品没有进行研究,即使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品,也没有引起研究者必要的“关注”。下面将要讨论的诗集《人底改造》,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的、被遗忘的文学作品。

二、诗集《人底改造》的“批判”

按照我们一般的“思维观念”,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作为一种作家身份,“部队作家”有时往往成为一种“保护色”。方之中的这种“部队作家”身份,对他的文艺创作真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吗?据查方之中生平情况,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的职务是华北军区军参谋长等职,这一职务至少也算是军队的高层职务。戎马生涯的方之中却利用业余时间,仍拿起笔从事一些文学活动,诗歌的创作显然是他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其他方面的创作目前笔者还没有完全关注)。虽然目前方之中在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完整的梳理,但诗集《人底改造》的创作,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这里,让我们把话题转向人民共和国初期,方之中创作的诗集《人底改造》。笔者对作为诗人的“方之中”感兴趣,是因为在笔者梳理的这套“十月文艺丛书”中,方之中的诗集《人底改造》列为丛书的一种,笔者差点遗忘了这部诗集及这个有着“传奇色彩”的军旅诗人。

《人底改造》这部诗集,1951年4月由天津知识书店出版,初版印数为五千册,定价为二千一百元。^[6]《自序》之外,收录的诗歌有《人民军队的大宪章》(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支枪》(一九五零年七月底)、《人底改造》(一九五零年一月三十日)、《我站在海岸线上》、《挖河小唱》(一九五零年五月二十二日)和《哈尔胡同之战》,共六首,页码为四十七页。虽然有几首诗没有标明诗歌创作的时间,但从诗歌写作的内容来看,这些诗基本的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1949年9月~1950年7月之间。诗歌结集出版之时,方之中以第三首诗——《人底改造》——作为整部诗集的“诗眼”。在《人底改造》这部诗集出版之前,诗歌《人底改造》早已出版过,它曾经编入阿英等执笔出版的《山灵湖》中。^[7]

显然,方之中很看重《人底改造》这首诗在诗集中的“重要意义”,否则他就不会把诗集用一种“不合时宜”的诗来“指代”整部诗集。读罢整部诗集后,笔者发现最重要的诗歌集中在《人底改造》和《哈儿胡同之战》。它们都是“叙事诗”,确实如诗人自己交代的,用叙事诗的形式写小说。诗集《人底改造》的取材,“全系军队生活。就题材来讲,有的宜于写小说,然因对于这种形式,我更感到生疏;(连用诗底形式,我也不熟练)同时近来叙事诗又似很流行,故此就用诗底形式来写了。”他在诗歌创作上还有一种“企图”,“即用声音色彩等形象来烘托一个故事,并从而给读者一些经验教训,不过我非画家,缺乏彩笔,致有力不从心之感。”不可否认,诗集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诗人自己对诗歌的不足有充分的认识,他认为,“在语言上,我还染有旧的流毒,另一方面又感到极其贫乏,所以在某些地方,削弱了内容的生动感人的力量。虽然清洗和休整了好几次,仍不合理。这个缺点,只好慢慢改正。”虽然有“力不从心之感”,虽然诗歌有不足的地方,方之中还是把这部诗集出版出来,可见他非常看重这部诗集,故他把诗

集的出版称之为“破题第一遭”。^{[6](1)}

从《自序》的文字中,我们发现:方之中表达出“谦恭”的态度,并没有张扬的“意思”。查方之中的文学创作历程,诗集《人底改造》确实是他的第一部诗集,之前他创作过的主要是小说、杂文等题材,诗歌的创作只是零散的,并没有像《人底改造》这么集中。这“破题第一遭”的诗集《人底改造》,却受到了来自《文艺报》的严厉批判,公开点名有问题的诗歌,正是他非常看重的《人底改造》。没有读到这部诗集之前,笔者只知道“十月文艺丛书”遭遇《文艺报》的点名批判,但这部诗集为什么会遭遇批判呢?查一九五二年七月号《文艺报》,它是这样批评诗歌《人底改造》的:

方之中的诗歌《人底改造》,描写了思想落后的“解放战士”张振东的思想转变,作品中是怎样表现他的转变的呢?作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他卧病床上时,班长能够不厌其烦地为他擦屎洗裤,这一行为感动了他,使他认识到“连队就是自己的家”,于是思想转变了。如果是适当地把班长对战士的生活上的照顾,描写为“解放战士”思想转变的条件之一,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这首诗却片面地把它强调为改造“解放战士”落后思想的关键,强调为张振东思想转变的决定因素。尤其错误的是诗中把模范班长自觉地伺候病号的高尚行为,写成是个人“取得威信的手段”。这样的作品,是把人民军队中严肃的改造思想的政治工作歪曲了。^[8]

显然,诗歌《人底改造》遭遇来自《文艺报》的“批评”,与张振东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很大的关系,它才是点名批判的真正症结之所在。那么,张振东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从落后人物形象到先进人物形象的“转变”上,人民共和国初期到底有哪些潜在的“规则”呢?所以,《文艺报》的这种批评方式,其实正暗含了人民共和国初期文艺创作的“规范问题”,这倒是值得我们好好加以梳理的。

查共和国初期的重要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我们发现:关于“新人物”的写作及有关小资产阶级人物描写的“讨论”,是相当频繁的。比如,《文艺报》一卷一期,刊登何其芳的文章《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透露,上海文艺界展开“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新文协会议结束后,回沪的文艺代表陈白尘在上海影剧协会开会欢迎文代大会话剧电影代表的宴会上,谈及“文艺为工农兵,而且应以工农兵为主角,所谓也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是指在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中可以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物出现”,这引发了《文汇报》对这种写作观点的“讨论”,持续的时间是1949年8月底到9月底),对这一话题提出严格的“规定”:“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便不应该以写小资产阶级,写他们的生活、意识、思想、情感为主,必须着重写出工农兵的生活、意识、思想、感情。着重写出如何在这些具体的教育之下改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9];《文艺报》一卷七期,展开关于写作“新人物”的讨论,共有三篇讨论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论述:“写新人物不如写旧人物生动,原因是新的人物正在各方面生长中,在逐渐形成中,不容易看到,如何写新人物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10];《人民文学》一卷二期上,发表何其芳的文章,提出“文艺作品必须善于写矛盾和斗争”^[11]。可以看出,寻找好的写作途径,表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时代里新人物的精神风貌,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给予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的“政治任务”,也是每个新形势下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使命”。周扬在新文协会议上就此专门谈及,“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显然,周扬在这里强调的,是英雄人物成长的平凡意义。虽然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但周扬认为,“工农兵群众不是没有缺点的,他们身上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所遗留的坏思想和坏习惯”,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以及群众的批评帮助之下,许多有缺点的人把缺点克服了,本来是落后分子的,终于克服了自己的落后意识,成为一个新的英雄人物”^[12]。在这样的文学劝诫和暗示之下,写真人真事,显然是最有教育意义的,所以,周扬提出“写真人真事是艺术创造的方法之一”正切合了人民共和国初期政治对文艺的“期待”。这一方面实现了教育的目的,一方面也实现了艺术的价值。但真人真事和典型的问题,却成为文艺工作者面临的棘手问题,诚如茅盾指出的:“关于真人真事与典型性的问题,好多同志有这样的感觉:作品的人物又要真人真事,又要典型性,似乎不能两全似的,照理论上说来,人物的典型性之构成,在于概括,既要概括,就不能用真人真事。然则真人真事与典型性果真有冲突么?事实上并不如此。”^[13]

真正落实到人民共和国初期具体的文学写作过程中,“人物转变”其实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有关

“人物转变”的讨论,也是人民共和国初期“文艺界”领导们和文艺理论家们经常讨论的问题,之后甚至涉及到对新的英雄人物的创造问题上,这些都牵涉到对人物的“转变过程”的文学描述。而当时有关“人物转变”的话题是很多的:以写乡村中二流子在生产过程中的转变,土改工作中的最初走了岔道,后来又得到改正的题材居多;自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伟大胜利,革命力量由乡村进入城市以后,表现各种样式的转变,内容的作品就更加广泛起来了。这里,有以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旧职员对新政权认识的改变为题材的;也有反映工人对劳动态度与技术观点的改变,那摩温对管理工人方式的改变的;还有表现工农干部在进入大城市后,对城市工作不熟悉,从消极退避到再学习的过程的。

显然,人民共和国初期处于新旧交替的革命时代,“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转变,常常是作家们要选择的主题”,“这因为革命本身,就是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在这威力无比的伟大变革里,无论如何,是不能不表示一定的向背态度,而不容有丝毫迟疑与犹豫。或者是走向人民,为革命服务;或者是继续做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情;两者总不能取其一。而如果选择前者,那就不能不对于自己过去的一切——包含生活态度与思想意识在内——重新来考虑与决定一下;因为不这样,你就无法接近人民,也就更不能为革命服务;历史就要将你遗弃在后面,而人民也将不需要你。”^[14]其实,中国革命本身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世界和改造全人类的”,那么,这就需要千千万万的人都涌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参加到改造人类的伟大事业中。著名文艺理论家萧殷就曾经专门在被称之为“文艺党校”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为年轻的文艺学员们讲授怎样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物转变”的话题。在他看来,五十年代的“人物转变”描写存在的形式有五种:(1)“只把人物转变前后的表现,并列地描写出来”;(2)“很注意人物转变过程的描写,但是,他们只从表面现象上去注意人物的转变”;(3)“描写思想变化的作品,虽然思想关键被作者抓住了,矛盾也被抓住了,但是思想变化被表现得过分突然”;(4)“写人物转变的作品,思想矛盾被描写得很明确,但作者所努力促成他转变的,着力于物质的力量或感情的体贴。作者企图以这些来感动人物,促进人物转变”;(5)“写‘转变’的作品,把思想矛盾提出之后,作者很有意识地去解决矛盾,而且紧紧地抓住这基本的思想矛盾;但是由于作者所选择的主题并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来的,而是从概念出发,即从概念中提出一个矛盾,就企图通过作品加以解决”。^{[15](90-93)}但这五种形式的“人物转变”描写,并没有真正打动读者,导致读者界和批评界对这样的写作提出批评。显然,“人物的转变”的描写是复杂的,为什么这些“人物转变”的描写最终没有打动读者的情感呢?这说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人物转变”的文学描写,并不是完全成功的,用萧殷的话来说,“不管你描写的是思想转变也罢,或描写思想发展也罢,要使作品能起教育作用,必须真实动人地写出思想矛盾”,“因为一个人的落后或‘思想不够进步’,在他意识里是存在着一种思想障碍的;只有把思想障碍解除了,思想的变化和发展才有可能”。^{[15](94)}

其实,在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文艺环境中,在写作“人物转变”这一话题时,最重要的是写出人物的思想变化过程,它与人民共和国初期提出的“思想改造”有着密切的联系。方之在《自序》中交代,这部诗集的取材来自军队生活,这些诗显然带有真人真事的“成分”。作为文学创作(当然包括诗歌的创作),“张振东”这一解放军战士形象仅仅是一典型人物而已,他是经过诗人的艺术雕琢之后,成为其具有重要意义的典型形象。但从“旧人物”到“新人物”的“转变”,怎样的“转变”,才是最合理的呢?关于这点,当时有很多讨论,其中有这样的观点值得我们加以注意:“至于描写旧人物的改造过程,应该是描写新人物的萌芽、生长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很真实的把握人物内部思想变化规律,并把握住这变化的社会(或阶级)原因,然后艺术地表现出来!这是很有意义的。”^[16]这里所说的“旧人物的改造”,其实就是旧人物的“思想转变”主题。《文艺报》的这种讨论,显然透露出重要的“实质”,旧人物如何转变成成为新人物,它有内在的“规范”:“人物转变的一般规律,是主人公最初在思想上落后保守,中间由于某种外因的启发和帮助,引起他重新思考,内心繁盛激烈的斗争,后来终于转变了。但一般规律性之外,还有其特殊性;一个人的思想转变,除了遵循一般的发展规律外,还有其特殊的具体的发展规律,带着某种时间与地的限制,人物的个性等具体根据和条件”。^[14]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方之的诗《人底改造》,以诗歌的艺术形式,试图对“人物转变”的写作进行新的尝试。他所形塑的人物,就是诗歌中的主人公之一——张振东。作为新的解放军战士,张振东经历

了很多人生遭际,当他成为解放军战士之后,他并不愿意当“解放军”。诗歌中是这样传达张振东这一落后人物形象的:“张振东仍是老主意:/吃饭打冲锋,/早操他不起,/上课老打盹,/行军他掉队,/他希望‘开除’,/正好回家里;/如果关禁闭,/正好要休息。/他怨解放军‘解’而不‘放’,/当‘解放’无任何出息。/开会斗争他,/他的听觉似乎早已麻痹,/脸上浮出傻笑,盘算着:/批评比‘国军’打骂好受十倍。”显然,在张振东这一落后人物形象的“背后”,其实指向的是他在思想上的毛病,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作为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出现张振东这样的人物是很正常的。军队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它本身就是思想改造的“熔炉”。张振东虽然成为解放战士,但思想上他离解放战士还很远。他老是想着老家,想着脱离人民军队。这样的人物,必然成为落后人物的“象征”。那么,落后人物向先进人物的“转变”,显然成为这首诗歌讨论的集中话题,也是这首诗歌容易遭人诟病的地方。张振东在旧军队里,是一个“旧人物”,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既然进入了人民解放军队伍里,他必然向“新人物”的方向“转变”。

诗歌中是怎样描述张振东的“转变”的呢?诗人从偶然的事件出发:“一个寒冷的冬夜,/张振东突然大声哭喊:/肚肠颠倒了秩序”,班长张耀堂并没有因为张振东的落后而袖手旁观,我们看诗歌中对他的形象塑造:“急得班长冒热汗;/他请来了医生,/又为病者轻轻地揉撼;/病人口渴腹肌,/又去烧水作饭。……班长只好自己脱下给他穿。/他忍受着刺鼻的臭气,/洗涤裤子的肮脏,/心潮汹涌地向上翻腾,/意识却十分明朗:/只有苦难中救人,/才能取得人的信仰。/可是洗的裤子还未烤干,/病者又拉了第二趟,/班长穿上潮湿裤,/又脱下干的给他换。”^{[6](17-19)}疾病的摧残下,张振东得到班长张耀堂的“悉心照顾”,特别是张耀堂“炽热真诚的火”,“融化了张振东顽固的心”,张振东实现了所谓的“转变”。他有“懊悔”的表现,他回忆起自己的出身及祖辈们的苦难生活,思想上对新的生活方式重新进行了认识,所以他“庄严地向班长提出保证:坏样儿让它死去,永远跟着你前进,前进!”

《人底改造》对落后人物“转变”的传达,显然立足的是班长张耀堂对落后人物是“思想洗礼”,但落后人物自己内心矛盾的“刻画”,特别是这一过程的“描述”,却没有在诗歌中得以体现(或者诗歌显得更加简单化)。张振东的“转变”,如果从诗歌中来寻求解答,我们认为其根本的原因是张耀堂在张振东生病期间的“悉心照顾”,最终才导致张振东从落后人物中转变过来。显然,诗人方之中企图以班长的这些思想感情付出来感动落后人物,促进落后人物的“转变”。这是最容易引起读者批评的地方。张振东这一人物形象的“转变”,在共和国初期的读者们和批评家看来,显得很唐突,诗人方之中把班长张耀堂的“悉心照顾”,当作独特的精神动力,张振东实现真正的“转变”所面临的“思想障碍”,却显得过于简单化。诗人内心深处,太看重所谓的物质和感情对落后人物转变的重要作用。这样的“人物转变”,容易引起人们的诟病。所以,《文艺报》提出“诗中把模范班长自觉地伺候病号的高尚行为,写成是个人‘取得威信的手段’”^[8],切中的正是诗歌的要害之处。方之中试图通过“兵演兵”的方式扩大对张振东这一落后人物形象的转变的政治意义及思想意义,但诗歌的阅读感受却适得其反。“人物的转变”的传达不能显得很突兀,“这是由一种思想战胜另一种思想的矛盾斗争的过程,这变化是由内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刺激逐步完成的,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虽然,有些人好象由一事情(一个因素)的刺激就彻底改变了他的思想,实际上,这个因素只不过是一个促成突变的近因;在这之前,一定已有其他的刺激不断地影响他,已动摇过他的思想根基了”^{[15](94)}。“人物的转变”的写作,正是要把这样一个心理过程,行动过程切实地描写出来。

在共和国初期的文艺话语建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形象的有效传达,是两种重要的政治使命,但从我们对方之中这首《人底改造》长诗的阅读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来自党组织和党员形象给予落后人物的影响,并直接描写出落后人物在这种影响下的“转变”。诗歌《人底改造》为什么遭遇批判,其原因显然不难理解。但这种批判本身,从组织的批判下指向个人时,导致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统一战线”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经验。文学战线作为军事战线的重要体现,它必然有军事思维的影响体现于其中,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文艺政策,成为“文艺界”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之一。即使到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文艺界仍旧实行着“统一战线”的文艺政策,新文协会议的召开,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党的文艺工作者和非党的文艺工作者,最终结成所谓的“联盟”,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但党的文艺界领

导人,始终对文艺队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比如,作为文艺界的头号人物,郭沫若就有如此的表述:“文艺上和政治上一样,统一战线里面有着不同的阶级,就自然有着不同的艺术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不可能一下子就归于一致。”^[17]那么,具体到共和国初期的文艺运动中,文艺界必然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形塑”新的文艺工作者,进而充实“党的文学”框架下文艺思想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是加强对异质性文艺创作的“批判”,从而起到一定的“规训”和“惩戒”的作用。形塑工农兵文艺工作者成为作家,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着手办理的事情,这从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创立可以看出,1950年7月开始筹备建立中央文学研究所,仿照的是高尔基文学学院的建构模式,试图形塑人民共和国新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管理人员。而对异质性文艺创作倾向的批判,当我们再一次远离时代去翻阅那一册册《文艺报》时,我们发现这样的“规训”或“惩戒”,充满着浓厚的火药味。

对诗集《人底改造》的批判,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作为诗人的方之中,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所承受的“压力”。福柯曾经指出,规训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而训练”,“它不是为了减弱各种力量而把它们联系起来。它用这种方式把他们结合起来是为了增强和使用它们”。^{[18](193)}方之中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虽然知道自已的问题属于内部问题,但应该知道这样的批判背后指向的是什?我们看到,共和国初期对“人物转变”的“批判”,归根到底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文艺工作者没有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学习好。显然,对方之中诗集《人底改造》的点名批判,是一种所谓的“规训”,即对诗人方之中的有效“训练”,党的文艺组织希望方之中在这样的训练中,逐渐成为坚实的党的文艺工作者。

《人底改造》本身想表达的是一个“思想改造”的主题,它演绎的虽然不是《白毛女》所表达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但从旧的人物转变到新社会需要的人物,诗人的主观意图无论如何都是好的,但诗集出版后文艺界最终才“发现”,需要改造的更是写作诗歌的诗人。这或许是人民共和国初期文艺创作的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好心的写作,等真正发表作品的时候,却受到的是来自文艺界的“批评”。主观意图和客观需要之间怎样才能达成一致,或许是50年代初期文艺工作者们绞尽脑汁的“问题”。但我们在看待文艺界这种批判运动的时候,不能以常态的方式加以“理解”。福柯在观察“规训权力”的体制中发现:“惩罚艺术的目的既不是将功补过,也不是仅仅为了压制。……它具有规范的功能。”^{[18](206)}《文艺报》提出对方之中诗歌《人底改造》的批判,正是为了实现其“规范的功能”,这种批判是为了实现“整齐划一”的模式,即“人物的转变”写作模式的有形轨迹的“描述”,它最终形成了模式化的写作。

题外的话

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个“题外的话”。《人底改造》这部诗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是值得我们研究者关注的。前面谈及,在梳理“十月文艺丛书”的时候,笔者差点遗漏了这部诗集。如果不是按照最笨拙的办法用出版社查找书目的检索方式,笔者肯定不会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发现这部诗集。之后,笔者通过网络进入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查找方之中的这部诗集,都没有找到库存样本和库藏本。南开大学位于天津,系知识书店的所在地,居然在馆藏中无法查找到诗集《人底改造》。笔者还是用这种方法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文科重点高校的图书馆查找,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诗集《人底改造》在这些高等学校图书馆并没有馆藏。这说明,“十月文艺丛书”出版受到批判之后,书籍被书店或国家大部分“收回”。

现在,我们能够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这部诗集,也算是《人底改造》这部诗集和方之中的“幸运”,坊间毕竟遗落下这部诗集,使后来的研究者知道在50年代初期还有方之中这么一个诗人。作为党内的部队文艺工作者,方之中并没有因为诗集《人底改造》被《文艺报》点名批评,就成为文艺界的“另类人物”,他躲过了高压下的文艺运动及批判,1950年10月,他作为志愿军高级参谋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方之中是“幸运”的。而与他同时受到批判的文艺工作者如路翎、萧也牧

等人,就并不是那么幸运,他们却接受了最严厉的命运制裁,特别是文革中,萧也牧被活活折磨致死,路翎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

参 考 文 献

- [1] 门岗.一位不该被遗忘的作家——方之中[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4).
- [2] 百度百科中的方之中简介,参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877.htm>.
- [3] 王永均.黄埔军校三百名将传[Z].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 [4] 姚新.左联辞典[Z].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
- [5] 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中国文学家辞典 现代第三分册[Z].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6] 方之中.人底改造(诗集)[Z].知识书店,1951.
- [7] 阿英.山灵湖[Z].读者书店,1950.
- [8] 李枫.评“十月文艺丛书”[J].文艺报,1952年第13号.
- [9] 何其芳.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A].何其芳文集(第4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10] 胡丹佛.创作·政策·新人物等问题[J].文艺报,1卷7期,1949-12-25.
- [11] 何其芳.文艺作品必须善于写矛盾和斗争[J].人民文学,1949,(2).
- [12]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J].人民文学,1949,(1).
- [13] 茅盾.目前文艺创作上的一些问题[J].文艺报,1卷9期,1950-01-25.
- [14] 王淑明.论作品中的人物转变[A].论文学上的乐观主义[C].文艺翻译出版社,1952.
- [15] 萧殷.论生活、艺术和真实[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16] 《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新人物[J].文艺报,1卷10期,1950-02-10.
- [17] 郭沫若.为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A].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C].新华书店,1950.
- [18]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Criticizing” of Fang Zhizhong and His Poetry Anthology *Rendigaizao*

Yuan Hongq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people always regard Fang Zhizhong as a soldier rather than a writer. As a modern Chinese writer and editor, he is obviously forgotten by us. This article tried to briefly introduce him and analyze his poetry anthology *Rendigaizao*. *Rendigaizao*, which was his important literature creation, was criticized by *Literature and Arts Newspapers* after the publishing. Thus finally Fang Zhizhong gave up his literature creation, so we can see the “internal cleaning”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early 1950s.

Keywords: Fang Zhizhong; *Rendigaizao*; criticizing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nternal cleaning